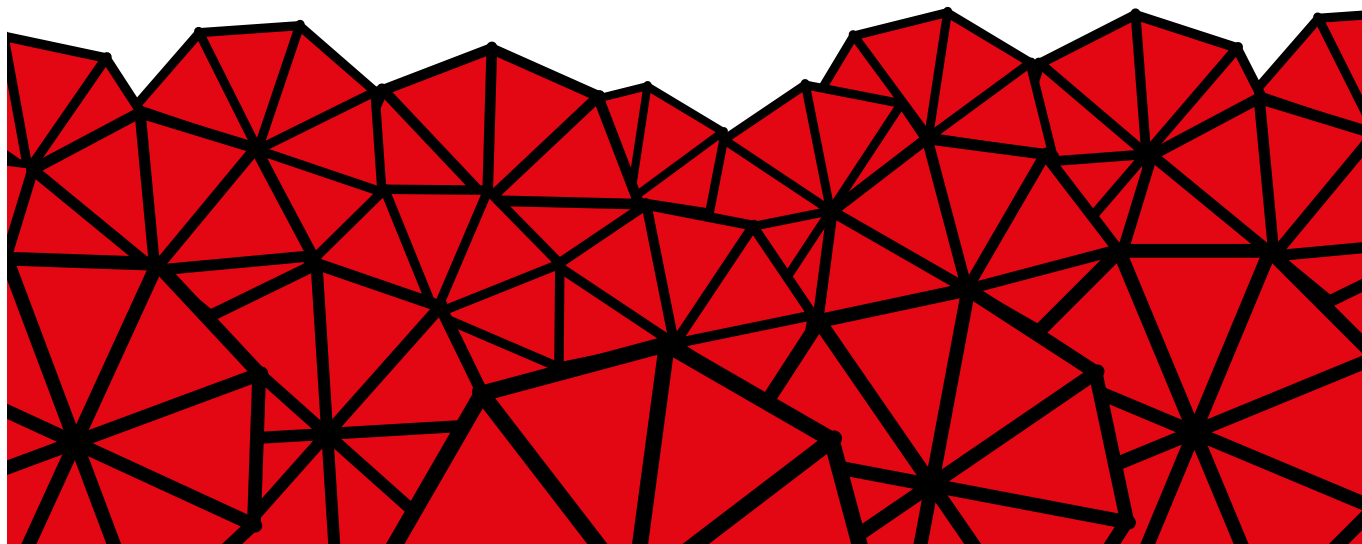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促进健康和人权

政策简报 对性工作者分布与 人口规模的估测

请谨慎使用本手册所
介绍的方法



对性工作者分布与人口规模的估测

请谨慎使用本手册所介绍的方法

介绍

性工作者所处的社会、法律和政策环境通常使他们面临更高的艾滋病毒感染风险。过去的几十年间，性工作者，尤其是女性性工作者成为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的监测对象。女性性工作者相关的研究和公共讨论，多与女性性工作者在全球艾滋病感染中占显著比例有关^{1 2 3 4}。在50个国家中，女性性工作者的艾滋病感染率比整体女性高12%。女性性工作者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性比不从事性工作的妇女高13.5⁵。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如不安全的工作环境，很难获得医疗服务，安全套使用协商困难等。自艾滋病毒蔓延之始，性工作者及其社群就受艾滋病影响很大⁶。

近年来，摸清性工作者生活和工作地点的分布、估计社群数量，越来越多地成为社群组织，项目官员和流行病学家的工作内容，有个体项目层面的，也有通过地方甚至国家层面人口规模估测的。很多时候，项目官员进行社群数量和分布估计仅仅是为了积累更多数据，而没有据此提供服务的计划。这些努力所花费的宝贵资源原本可以用于提供服务，对艾滋病的新发感染和流行产生影响。尽管几十年来性工作者组织都在以不同形式开展此类活动，但这些活动越来越普遍，而且其开展方式经常会对性工作者的安全、隐私和福祉产生负面影响。必须说明，对项目计划进行所在地的估计能够帮助改进提供服务。但国家和区域层面上的估计或日益普遍的人口规模估测却不是这样。

近来，全球基金、世界银行，以及亚洲和西非的政府部门对重点人群使用地理分布和估计（枚举法）来计划艾滋病预防资金的分配。他们使用的技术包括记录性工作者生活和工作的具体地点和次数，以及“危险”行为发生的场所。即使是艾滋病流行率相对较低的国家，也开始使用这些技术⁷。

本文对社群数量、地理分布和特别识别码的内容和使用方式进行了综述和评论。讨论了这些活动暗含的威胁，及保证个人安全和数据保密的策略。

他们使用的技术包括记录性工作者生活和工作的具体地点和次数，以及“危险”行为发生的场所。

- 1 Prüss-Ustün, A., Wolf, J., Driscoll, T., Degenhardt, L., Neira, M., & Calleja, J. M. G. (2013). 《女性性工作的HIV艾滋病毒负担：区域和全球估测》，PLoS ONE, 8(5), e63476.
- 2 Halli, S. S., Ramesh, B. M., O'Neil, J., Moses, S., & Blanchard, J. F. (2006). 《团体在印度卡纳塔卡女性性工作者的性病与艾滋病预防中的作用》，AIDS Care, 18(7), 739-749页.
- 3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世界银行，《与性工作者合作实施全面艾滋病毒/性病项目：协作干预的实践应用》，日内瓦，2013年
- 4 Baral, S., Beyrer, C., Muessig, K., Poteat, T., Wirtz, A. L., Decker, M. R., . . . Kerrigan, D. (2012). 《中低收入国家女性性工作者的艾滋病负担：系统性回顾与元分析》，《柳叶刀传染病》，12(7), 538-549页.
- 5 同上
- 6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世界银行，《与性工作者合作实施全面艾滋病毒/性病项目：协作干预的实践应用》，日内瓦，2013年
- 7 Lorway, R., & Khan, S. (2014). 《重组流行病学：印度艾滋病预防中对人群的图绘，监控和包装》，《社会科学与医学》，112(0), 51-62页.

定义

- ▶ **流行病学**：“研究疾病在人群中传播的方式以及影响传播的因素”⁸。为识别风险因素和健康后果，流行病学使用数据和筛检工具来监控特定人群的健康和疾病情况。
- ▶ **流行病学图绘**：展示与物理空间和人群有关的人口统计学、环境、行为、社会经济、基因和感染风险因素的一组工具。它可以是疾病案例的地理分布，发生某疾病的高危活动的地点，或医疗服务机构的地点。
- ▶ **地理图绘**：流行病学图绘的一种类型，将具体的地理位置与健康成果、风险或状况相联系。例如，经济来源较少的社区通常健康水平较低。对性工作者而言，流行病学图绘常用于在地图上标明性工作者工作或居住地点，以显示艾滋病和性病“高危”人群的所在地。
- ▶ **人口规模估测和枚举**：估测某地理区域内一组个体的规模的方法，用于健康卫生监控，使用专业数学方法。“枚举”常用于描述对人群每个成员计数。可用于项目规划和服务提供。
- ▶ **特别识别码(UICs)**：由数字或/和字母组成。用于将个人数据与人口统计学信息、健康状况或健康服务使用状况等信息相联系。某些特别识别码还包括指纹和虹膜扫描的生物统计学信息，这是人权侵害。
- ▶ **热点**：通过地理图绘所识别出的“高危”行为发生地点。

图绘和人口规模估测

图绘及相关的其他方法（如人口规模估测和用以识别个体的编码）传统上用于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研究疾病的地理特性和传播。近些年来，对艾滋病和减低伤害的地点和情境的关注，使流行病学家和其他学者、资助机构和一些社群组织越来越多地使用流行病学图绘^{9 10 11 12}。

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联合国发展署，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世界银行在2013年发布了《与性工作者合作实施全面艾滋病毒/性病项目：协作干预的实践应用¹³》（一般称为《性工作者实施工具SWIT》）。该文件详细介绍了世界卫生组织2012年提出的关于艾滋病和性工作的建议的实施方式¹⁴。文件强调了草根层面的落实，以及由本土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主导组织领导。文件将这些方式视为社群主导性工作者外展的一个进步。这些方式可用于计划高效外展项目，以“为尽量多的社群成员提供可接受的易获得的服务”。SWIT强调图绘工作的开展方式必须尊重性工作者的需求与安全，有项目地的性工作者参与和领导。SWIT也指出，所获得信息必须高度保密，“以防执法部门或其他群体利用图绘信息来定位性工作者，关闭其活动场所或进行其他伤害性工作者的行动”。本土图绘应当用于提供服务，而不是为区域或国家人口规模估测提供数据。避免因分享信息导致对性工作者的伤害。

SWIT强调图绘工作的开展方式必须尊重性工作者的需求与安全，有项目地的性工作者参与和领导。

8 Gordis, L. (2009). 《流行病学》，费城，pp: 3

9 Ferguson, A. G., & Morris, C. N. (2007). 《肯尼亚北卡里多高速性交易图绘》，《健康与场所》，13(2), 504-519页

10 Fulcher, C., & Kaukinen, C. (2005).《艾滋病服务机构地点图绘与可视化：多伦多街区探索性空间分析》，《艾滋病关怀》，17(3), 386-396页。

11 Kaukinen, C., & Fulcher, C. (2006).《多伦多街区艾滋病服务的社会人口学和地点的图绘》，《社群健康与社会关怀》，14(1), 37-48页

12 Weir, S. S., Pailman, C., Mahlalela, X., Coetzee, N., Meidany, F., & Boerma, J. T. (2003).《从人群到场所：关注最需要艾滋病预防工作的地方》，《艾滋病》，17(6), 895-903页。

13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世界银行，《与性工作者合作实施全面艾滋病毒/性病项目：协作干预的实践应用》，日内瓦，2013年

14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世界银行（2012），《面向中低收入国家性工作者的艾滋病/性病预防和治疗：公共卫生途径建议》，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

2015年，WHO发布了《卫生领域艾滋病毒综合战略信息准则》¹⁵。该准则建议使用受HIV/AIDS影响的关键人群的区域和国家层面人口规模估测来指定和扩大HIV预防、治疗和关怀。性工作者是关键人群之一。上述方式被视为可促进资源分配、倡导和指标追踪。尽管该准则提出，在涉及到告知时，一定要考虑性工作者和其他关键人群的安全。但它并没有提到政府机构收集此类详细信息可能存在的危险。没有比较图绘和人口规模估测为性工作者带来的利弊大小。报告将这些方式作为唯一能够实现为关键人群提供HIV相关医疗服务的途径，并没有讨论任何替代方案。

如果图绘的目的仅仅是进行人口规模估测而无意于改善服务提供，则可能产生更多问题。

人口规模估测数据依赖于对所关注地区被假定为HIV和其他感染高风险群体的鉴别、计数和地理图绘。他们对整个群体应用同样的风险控制，这是有问题的，尤其是在保密得不到尊重的情况下。如果图绘的目的仅仅是进行人口规模估测而无意于改善服务提供，则可能产生更多问题。

人口规模估测使用各种方法以获得有效的人口估测数字。性工作者社群人口规模估测的基础是直接来自关键人群处收集的数据，即使全国水平的估测也是如此¹⁶。“捕获再捕获”方法是对人口规模的间接估测。根据不同来源的人口规模信息，评估重合程度，使用统计工具获取总人口数的估值¹⁷⁻¹⁸。另外两种常用方式是普查和枚举。普查对该人群的所有成员计数。枚举是圈定一个范围，对选定范围内人群的一部分计数，对数字进行推断来获得估值¹⁹。最后，还有一个常用方法是“乘数”，比较两个独立来源的人口数据，对总人口进行估测²⁰。

“地理图绘”常用于卫生领域多种情境的研究。用这种方法记录人们参与“高风险”行为的地点，和提供减低伤害及关怀服务的地点。在开普敦，一项关于针对性HIV预防的研究项目，就使用图绘来确定安全套可得性和人们寻找性伴侣的新地点²¹。在多伦多加拿大城，对HIV服务机构的图绘显示了难以获得HIV服务的地区的人口特征，据此改善服务。这些地区集中了经济弱势、移民和流动性高的特点²²。

SWIT建议，有条件时，图绘工作的计划和实施应当咨询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只有在确定对性工作者没有危险时，才能纳入妓院老板和酒吧经理等关键信息人。关于谁可以接触包含性工作者地点和身份信息的图绘资料，必须万分谨慎地选择。SWIT强调，如果保密资料被泄露，则“项目会失去社群的信任”。如果图绘所收集的信息被传播或泄露，性工作者的安全和福祉将受到威胁。因此，关键在于信息由性工作者主导组织来妥善保管，同时项目官员和研究者也要安全保管信息。

使用目的

本文介绍的地理图绘、流行病学图绘和人口规模估测技术可以各种形式单独或组合使用，以满足不同目的。重要的区别在于，这些人口估测和图绘是由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和其他社群组织为提供服务而开展的，还是由区域或国家卫生部门或其他政府机关开展的。本部分讨论这些方法的使用和目的。

除了估测某地点性工作者数量之外，地理图绘和人口规模估测也可用于寻找目标群体成员的差异。例如，在墨西哥，来自南美的未登记移民性工作者更多见于城市交界处，而墨西哥女性则更靠近中心地区²³。

15 世界卫生组织 (2015), 《卫生领域艾滋病毒综合战略信息准则》，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

16 世界卫生组织 (2010), 《对HIV高危人群规模的估测准则》，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

17 Chao, A., Tsay, P. K., Lin, S. H., Shau, W. Y., & Chao, D. Y. (2001).《捕获再捕获模型在流行病学数据上的应用》，《统计医学》，20(20), 3123-3157。

18 《捕获再捕获和多重记录系统估测I: 历史与理论发展》，《疾病监控和预报国际工作组》，(1995). *Am J Epidemiol*, 142(10), 1047-1058

19 世界卫生组织 (2010), 《对HIV高危人群规模的估测准则》，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

20 世界卫生组织 (2010), 《对HIV高危人群规模的估测准则》，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

21 Weir, S. S., Pailman, C., Mahlalela, X., Coetzee, N., Meidany, F., & Boerma, J. T. (2003).《从人群到场所: 关注最需要艾滋病预防工作的地方》，《艾滋病》，17(6), 895-903页。

22 Kaukinen, C., & Fulcher, C. (2006).《多伦多街区艾滋病服务的社会人口学地点的图绘》，《社群健康与社会关怀》，14(1), 37-48页

23 Uribe-Salas, F., Conde-Glez, C. J., Juarez-Figueroa, L., & Hernandez-Castellanos, A. (2003).《墨西哥和中美洲女性性工作者的疱疹单一病毒类型2感染相关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和性活动》，《流行病与感染》，131(2), 859-865页

能否减少这些技术工具带来的潜在风险，取决于谁在使用工具谁在控制数据…

同样的方法学也可用于辨识未得到充分服务的群体、亚群体和项目尚未接触的群体。例如，对肯尼亚北卡里多高速卡车停靠站的图绘，辨识出了若干性工作发生的热点，并指出没有获取HIV预防和其他医疗服务的“易感”性工作者群体²⁴。爱沙尼亚一项图绘研究显示，在居民区，性工作远比假想中普遍²⁵。

这些结果有助于解释项目和服务没能接触性工作者社群中部分群体的原因。温哥华一项地方图绘研究项目从地理层面凸显了医疗服务和针具可得性的关系。结果显示，对室外女性性工作者的暴力和警察执法，会导致性工作工作者避开某些地点。性工作工作者被迫去偏远的工业区活动，导致他们远离医疗和社会支持，难以获得安全注射和减低伤害用品²⁶。了解某些场所的角色和人们对这些场所的看法，对项目计划非常重要，对涉及保护性工作工作者安全的政策极为关键。这个研究是Maka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是社群HIV预防研究合作。社群伙伴和同伴研究组由曾经或现在的性工作工作者组成，他们参与研究构想、设计和实施。

本文讨论的技术和工具在地方层面上非常有用，使性工作工作者主导组织和服务机构获得其他方式不能提供的复杂详细信息整合。但是，

它们也为性工作工作者的一些权利带来了潜在重大风险。NSWP《关于性工作、人权的共识声明》概述了这些权利，包括健康权、隐私权、免于任意干预的权利等²⁷。如果图绘由管理部门而不是性工作工作者进行，或在各层面没有性工作工作者的参与，这些风险更是大幅提升。如果性工作工作者没有

参与，则信息就更可能被政府部门（卫生部门和执法部门）获得。能否减少这些技术工具带来的潜在风险，取决于谁在使用工具谁在控制数据：是社群组织，服务机构、国家机关还是反性工作组织。

特别识别码

特别识别码自应用之始，HIV运动²⁸和性工作工作者权利运动就对其争议不断。它可以将个人身份信息和保密信息相联，如健康情况或医疗使用情况。对性工作工作者主导组织和项目，特别识别码将每个性工作工作者个体数据关联到一个特殊编码，该数据通常关联：

- 1 描述个体身份和人口学特征，如年龄、性别、性工作类型、从业时间等；
- 2 详细“基线”信息，如性工作中安全套使用报告，一周伴侣数量估计，上一年是否自愿检测HIV等。

收集这些具体信息的理由是，有利于估计减低伤害服务和在项目计划是评估风险²⁹。

使用特别识别码更常见的理由是，编码有能保护个体身份信息的能力。可以在不威胁个人数据保密性的同时使用他们的数据进行分析 and 项目计划^{30 31}。编码也被视为可以防止数据复制，有利于充分辨识新个体，协助服务重新定向以满足项目需求和模式³²。尽管这些理由不断出现在学术论文和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规划署等机构的官方准则中，目前并没有明显证据证明特别识别码真的能够保护性工作工作者的保密性信息，也没人讨论特别识别码的使用是如何直接有益于性工作工作者个体的。

24 Ferguson, A. G., & Morris, C. N. (2007).《肯尼亚北卡里多高速性交易图绘》，《健康与场所》，13(2), 504-519页

25 Aral, S. O., Lawrence, J. S. S., & Uusküla, A. (2006).《爱沙尼亚塔林的性工作：性工作在社区中的社会空间渗透》，《性传播疾病》，82(5), 348-353页

26 Shannon, K., Rusch, M., Shoveller, J., Alexson, D., Gibson, K., & Tyndall, M. W. (2008).《图绘暴力和治安成为吸毒的女性街头性工作工作者获取医疗和针具服务的制度环境障碍》，《国际毒品政策期刊》，19(2), 140-147页。

27 NSWP. (2013).《关于性工作、人权的共识声明》，爱丁堡

28 Forbes, A. (1997).《关于特别识别符的活动者指导》，《活动之声》，<http://www.actupny.org/alert/names03.html>，最后登陆2015年10月6日。

29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世界银行，《与性工作工作者合作实施全面艾滋病/性病项目：协作干预的实践应用》，日内瓦，2013年

30 同上

31 Forbes, A. (1997).《关于特别识别符的活动者指导》，《活动之声》，<http://www.actupny.org/alert/names03.html>，最后登陆2015年10月6日。

32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世界银行，《与性工作工作者合作实施全面艾滋病/性病项目：协作干预的实践应用》，日内瓦，2013年

当前和未来对生物统计学措施和特别识别码的普遍使用，如指纹、虹膜扫描和其他身体识别资料，令人极度不安，并构成了人权侵犯。这些措施的使用伴随着对隐私的潜在侵犯，并增加了性工作者在被刑事定罪的环境中受到追踪和记录的风险。另外，这些措施需要较高水平的技术，较小组织无法长期保证高技术水平，从而导致更多错误和保密信息泄露。特别身体识别可用于信息分享或联结不同来源的信息，而性工作者对此可能并不同意或知情。这些信息也可能用来对性工作者造成伤害。虽然任何信息收集都存在这样的风险，生物统计学措施的特殊性增加了风险，恶化了破坏保密性的后果。

关键的是，使用这些措施有可能阻碍一些个体使用重要服务，因为生物统计措施（如指纹提取）可能会涉及到犯罪记录，而拒绝提供生物信息就无法获得服务。

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发布的准则³³鼓励医疗机构使用特别识别码记录来访者是否属于某个关键人群，以更好地追踪覆盖情况。准则是出于安全理由提出这点，“不太建议对这些信息进行日常收集”³⁴。

考虑到在很多环境中性工作都完全或部分被刑事定罪，就很有必要考虑使用特别识别码带来的利弊。

考虑到在很多环境中性工作都完全或部分被刑事定罪，就很有必要考虑使用特别识别码带来的利弊。如果特别识别码得到全面使用，则必须谨慎规划信息的获取和储存，以避免组织内部破坏保密性以及执法和卫生部门侵犯保密性。因此，记录所有编码和相关信息的总表极为重要，必须由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妥善保管，仅允许有限人员获取，并在使用时遵守严格的规定。

通过地理图绘、人口规模估测和特别识别码收集的信息非常敏感，任何对保密性的破坏都可能直接损害性工作者的健康权、安全和隐私权。在地图和出版物行标识性工作者生活和工作的地点，可能导致并且已经导致对性工作者的骚扰和刑事定罪。导致失去住房，如果性工作者有子女或其他受抚养的人，还可能遭到社工干预。除了这些植物，性工作者还会损失经济收入。另外，这也使性工作者可能遭到卫生部门、执法机构和反性工作群体的持续追踪。

对安全、隐私和福祉的威胁

2013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一个资金充足的反性工作组织“反性剥削联盟”（the Coalition des luttes contre l'exploitation sexuelle (CLÉS))鲁莽地图绘出所有“性剥削”场所分布，包括色情舞蹈俱乐部，按摩沙龙，应召机构，有“性感女服务员”的餐厅等，并在主流报纸上发表。这直接危及了性工作者的生计和安全。在报纸发表之后两年，这个地图仍然可以在网上找到。

2013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一个资金充足的反性工作组织“反性剥削联盟”（the Coalition des luttes contre l'exploitation sexuelle (CLÉS))鲁莽地图绘出所有“性剥削”场所分布，包括色情舞蹈俱乐部，按摩沙龙，应召机构，有“性感女服务员”的餐厅等，并在主流报纸上发表。这直接危及了性工作者的生计和安全。在报纸发表之后两年，这个地图仍然可以在网上找到。

³³ 世界卫生组织 (2015), 《卫生领域艾滋病毒综合战略信息准则》, 日内瓦, 世界卫生组织。

³⁴ 世界卫生组织 (2015), 《卫生领域艾滋病毒综合战略信息准则》, 日内瓦, 世界卫生组织。

事件1: 肯尼亚

在肯尼亚内罗毕开展了一项研究项目，估测城中性工作者数量，使用的方法为图绘和捕获再捕获。该项目在2013年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该论文不仅详细列出了研究成果，还包括一份地图，上面标识了进行计数的地点和性工作者出没地点。作者在地图上做了浅显的伪装，如消去街道名字等。但任何了解内罗毕的人都能根据这个地图知道哪里能找到性工作者，以及大概有多少个。文章发表之后，主流媒体对性工作者进行了大量曝光，不经性工作者同意就秘密拍摄他们工作。安全部门对一些热点进行了突然搜查，性工作者及其客人被捕。在一些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学者、性工作者、民间组织和公共卫生工作者的坚持要求下，该论文删去了地图。但是，该期刊 (PLoS) 在2015年10月仍提出“对原图表信息有学术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联系作者索取”。这意味着，任何能给作者发邮件的人都仍可能获得数据。

这个实例显示，人口规模估测和图绘性工作者活动场所的成果有可能直接对性工作者免于歧视的权利、隐私权和免于任意干预的权利造成威胁。即使数据是在个体同意的情况下获得的，数据处理和分享方式也已经使性工作者置于险地，并可能使他们面临更多危险。研究者的鲁莽态度更有力证明了图绘和人口规模估测的风险。这个案例所提的问题是，发展项目的益处是否大过收集这些信息所带来的风险。性工作者不仅有权利决定是否提供个人数据信息，还应当能对信息的使用和分享做知情同意的决定。

研究者的鲁莽态度更有力证明了图绘和人口规模估测的风险。

过度依赖数据

即使不考虑流行病学图绘和人口规模估测的严重威胁，这些方法学和对数据过度依赖的方式，并不总能准确描绘是什么造成性工作者越来越容易受到HIV和其他性传播疾病的感染。

流行病学的“风险”概念一般只是简单考虑性活动的生物风险，忽视政策法律和污名造成的特殊的易感性。这种特殊易感性会使人在性活动中面临更多风险。对性工作者进行刑事定罪的法律政策环境，和地方性工作组织，这些在进行性工作相关风险图绘时也同样重要。质性方法和数据可以提供丰富信息，有助于项目设计，至少能对定量数据进行补充。

例如，在前文所提的加拿大研究中³⁵，有一部分是与性工作者一起设计和引导焦点小组访谈，辨识社会和系统性的暴力和权力关系在塑造艾滋病风险环境和女性性工作者的亚群体的预防措施中的角色³⁶。2007年在加拿大开展了一个倡议，旨在图绘出艾滋病和性传播疾病的易感群体位置，以估测所发生的活动类型和参与活动的人数³⁷。为更好地了解城市不同街区的多元和差异，开发了一种质性工具来记录社群环境，收集无法通过数据图绘方式获得的信息。该工具记录的信息包括每个街区的交流方式、移动性、社会范式、社群特征、文化、经济、警方活动和可获得的资源与服务。这些示例并不完美，但显示了质性数据可以更精确地反映出性工作实况。

35 Shannon, K., Rusch, M., Shoveller, J., Alexson, D., Gibson, K., & Tyndall, M. W. (2008). 《图绘暴力和治安成为吸毒的女性街头性工作者获取医疗和针具服务的制度环境障碍》，《国际毒品政策期刊》，19(2), 140-147页。

36 Shannon, K., Strathdee, S. A. P., Shoveller, J., Rusch, M., Kerr, T., & Tyndall, M. W. M. D. S. (2009). 《女性性工作者在与客人协商安全套使用时的结构性环境障碍》，《美国公共卫生期刊》，99(4), 659-665页。

37 Ormond, M. L. E. (2008). WIN-MAP: 《对Winnipeg的HIV高危风险地点进行地理图绘的可行性研究》，Winnipeg.

这类研究，这种对人口规模估测和图绘结果的建构，加强了对性工作者的污名，恶化了对性工作者造成伤害的政治社会环境。

根据所用的方法，一些估测并不依据对整个人口的调查，而是通过对人口中部分成员进行询问，来估计在某地有多少性工作者工作和他们来到当地的时间。^{38 39} 如果是没有其他信息途径，那这种方式可能是适当的，但并不清楚这种信息是否准确，足以对改善服务提供有参考价值。例如，有些地方的性工作非常隐蔽，性工作者自己都可能不知道其他性工作者在哪里工作。而且，这也取决于开展研究的人。性工作者可能并不情愿分享这类信息，也不能提供准确的估计。性工作者隐瞒这些信息也是很合理的，这关系到他们自身安全和社群的安全。

在一些案例中，数据将所有性工作发生的场所都作为“高危行为”发生场所。这通常是开展调查的理由和数据分析的方式。我们明白性工作者可能有较高风险感染艾滋病和其他性病，但我们也知道不是所有性工作者都面临同等风险，也不是所有性工作地区和场合都有同样风险。^{40 41 42} 这类研究，这种对人口规模估测和图绘结果的建构，加强了对性工作者的污名，恶化了对性工作者造成伤害的政治社会环境。

通过人口规模估测和图绘产生的信息确实能够有助于项目设计。但是，如果不考虑造成性工作相关的特殊易感性的原因，那么收集这些信息是危险的。同样危险的是，认为所有性工作的场合和类型都有相同风险，或这一个信息就能真实反映某个特定环境的性工作实况。对数据手段的依赖有利于资助者进行数据管理和监控资金使用，但这怎么能保护性工作者的权利？

独立于社会、政治和法律环境的方法学应用

这些方法学是作为可以在任何地方以同样简易程序使用的“工具”呈现的。但是，性工作组织方式在不同场合中是存在差异的。如果全面使用这些工具，就需要考虑性工作所处的多种多样的社会、政治和法律环境。重点是，确保数据产生不会使性工作者陷入危险，还要保证数据有效有代表性。在对性工作进行刑事定罪的地方，收集性工作者工作地点的信息就非常危险，即使本意是为性工作者开发艾滋病预防和治疗项目。另外，如果不考虑当地环境，则数据的质量也会受到负面影响。

保证人身安全和数据安全

大多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和其他为性工作者提供服务的组织都会以某种形式保存成员信息。他们收集信息的一些方式类似与地理图绘和人口规模估测的技术。这些信息对他们项目计划很重要，有时也是他们的资助机构所要求的。为对其成员负责，这些数据也是必须的，可以显示和追踪所提供的服务。但是，向资助方提供的数据或公开的数据通常是整体数据，不会对性工作者的安全造成危险。

一些NSWP成员分享了他们在人口规模估测和图绘方面的经验，肯定了由社群组织来完全控制数据是成功的策略，是减少这类信息的收集和保管的相关风险的重要因素。根据法律社会环境，一些组织选择避免收集任何服务对象的个人信息，以保护获取服务者的个人安全。国际组织推崇特别识别码，认为它可以保护性工作者的保密信息，保证他们的安全。但是，他们的安全完全依赖于数据保管安全，受控于那些不会在未取得同意时分享信息的组织和机构。

38 Emmanuel, F., Blanchard, J., Zaheer, H. A., Reza, T., & Holte-Mckenzie, M. (2010).《艾滋病毒与艾滋病监控项目图绘方式：对巴基斯坦HIV高危群体进行图绘和规模估测的创新方式》，《艾滋病》，24(SUPPL. 2), S77-S84.

39 Elmore-Meegan, M., Conroy, R. M., & Agala, B. C. (2004).《肯尼亚性工作者，客人数量和相关风险：探索性调查》，《生育健康事务》，12(23), 50-57页。

40 Spittal, P. M., Bruneau, J., Craib, K. J., Miller, C., Lamothe, F., Weber, A. E., . . . Schechter, M. T. (2003).《在性产业生存：两个加拿大城市的从事街头性工作的注射吸毒女性的HIV风险行为比较》，《艾滋病关怀》，AIDS Care, 15(2), 187-195页。

41 Day, S.E., and Ward, H. (2007).《英国政策导致性工作者的易感性》，BMJ 334:187-187.

42 Rekart, M. L. (2005).《性工作减低伤害》，《柳叶刀》，366(9503), 2123-2134.

事件2: 印度

Ashodaya Samithi是一个性工作者主导组织,从2004年起在南印度的麦索尔城活动,为成员和相关社群提供倡导、医疗服务、安全套发放和HIV预防服务。过去,在与多个国内国际机构、研究中心和学术机构的合作中,他们使用了多种方法来估测社群规模,定位成员工作地点、对服务进行规划以及监控新增性工作活动。

综合多种技术手段是一种重要的策略,使Ashodaya的成员和员工可以更深入全面了解社群实况,保证组织接触到尽可能多的社群成员。创始成员和员工都表示,他们认为最关键的是要“链接科技与社群”,并让社群成员与外展员工形成互惠关系,社群成员提供信息使员工能够调整提供服务的方式。这种紧密合作使Ashodaya能够记录性工作方面的变化,如大量从街头工作转向现在居家工作。Ashodaya使用不同社群主导方法,如社交网络图绘、捕获再捕获、地点侧写和联系人图绘等来进行性工作计数并记录领域变化。

性工作使用社交媒体和手机应用的越来越多,尤其是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这影响了提供服务的方式,也意味着需要新的数据收集方式。

Ashodaya开展的监控和数据收集都是由社群完成,目标是改善社群生活,研究人员和其他人都只是合作者。工作也受到理事会的严密监控。他们所收集的信息是用于发掘社群需求的。Ashodaya成员同意回答问题,是因为他们相信Ashodaya只会问必须问的问题,也因为他们指导自己的信息是保密的,是得到安全保管的。Ashodaya自信他们所收集的信息是高质量的,因为他们和社群有着信任关系。保密也非常重要,能够使Ashodaya安全地为成员提供服务。

Ashodaya成员同意回答问题,是因为他们相信Ashodaya只会问必须问的问题,也因为他们指导自己的信息是保密的,是得到安全保管的。

Ashodaya使用特殊识别码来辨识每个使用其服务的性工作者。特殊识别码各自与一份文件对应,文件包含了成员的基本联系信息和人口学信息。该信息以打印和数码形式保存。接触这些文件是受到项目主任(社群成员)的严格监管的,仅有特定的重要员工(顾问和医疗员工)才能接触。所有数码文件都有密码保护,打印版本必须锁起来。Ashodaya经常拒绝分享记录或任何附加信息的要求,无论提出要求的是捐助方、执法部门、国家或国际机构。使用特殊识别码使他们可以提供项目量化产出的信息(获取服务的人数、服务类型、联系人数量、追访信息等),同时能够保持成员匿名和安全。

在组织的历史上,从未有过一次破坏保密性。Ashodaya成员坚持,性工作主导组织应当收集他们自己的数据,并只为卫生、研究和政府机构提供关键信息,以防警方或反性工作组织进行危险干涉获取数据。

事件3: 加拿大

Stella, l'amie de Maimie是一个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刚刚庆祝了成立20周年。外展员工记录了服务信息包括发放的安全套等减低伤害物资数量，和他们有人际来往的对象数量。但是，他们从不记录任何谈话对象的健康信息，也不记录使用服务人员的姓名。他们所记录来往对象的在城市中的生活区域（无精确地址），年龄层，自我认知的社会性别，这些基本人口学信息让他们对来寻求服务的人有了整体的概念。记录的信息用于满足资助方要求，也展示了组织的可问责性，保证组织在实现自身使命。这些主要用来展示他们做的工作，并跟踪行业中的实况动态。他们在年度报告中非常谨慎地使用这些数据，确保敏感信息不会被识别。他们不使用特殊识别码。他们紧密监控性工作者经历的压迫，以了解人们流动的原因。

对于Ashodaya而言，他们通过图绘和人口规模估测获得的数据使他们能够持续改善他们的服务，并能接触到新的性工作者。对Stella而言，他们获取的信息，虽然量不大，但使他们能够监控自身的工作以及联系的对象。在这两个案例中，对数据的收集和使用有着全面掌控，是保护人身和数据安全的成功策略。但是，对图绘和人口规模估测的数据收集有全面掌控，这需要较强的调研能力和资源，可能不适用于所有项目。而的

在这两个案例中，对数据的收集和使用有着全面掌控，是保护人身和数据安全的成功策略。

案例显示出，避免将人口学信息和服务使用相关联，也是保证成员安全的有效方法。

建议

人口规模估测和图绘有可能对性工作者及其社群非常危险。采用这些方法时，必须高度谨慎，严格遵守数据的所有权和保密性相关规则。这些方法的使用越来越普遍，即使不是对组织最合适的解决方法，很难避免参加相关工作或使用这些方法。但也有可能拒绝完全参与，并提出安全收集管理数据的替代方式。以下建议有助于这些方法得到安全合乎伦理的使用：

特别识别码：

- 与地理和健康数据相关的信息是否是设计有利于性工作者项目的唯一方法或最佳方法，目前还缺乏证据进行判断。并不明确性工作者的特别识别码带来的直接益处要大于其风险。
- 如果使用，则数据和“管理名单”（即涉及性工作者身份识别的保密信息保管处）必须由性工作者组织控制。
- 如果使用，不能将各数据组（描述个人身份和人口统计学的信息组和健康信息组）相连接。
- 如果使用，特别识别码不能包含个人身份识别信息，如生日。
- 如果使用，不能应用指纹等生物统计学方式。

考虑数据收集、分析和传播的环境：

- ▶ 性工作者必须完全理解并在全程都有控制和参与，包括数据收集、分析和传播。
- ▶ 质性数据（故事）应当纳入数据收集，以改进数据质量，有助于评估收集该信息的风险。

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主导组织问责意味着关注性工作者安全和权益保护。

- ▶ 图绘和人口规模估测应当用于建立或改善为性工作者提供的服务与支持。
- ▶ 只应当收集能够直接促进为性工作者提供服务和安全的信息。
- ▶ 信息的数据收集、分析、使用和传播，必须由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管理。

结论

地理图绘和人口规模估测对组织监控社群动态和服务对象变化是有帮助的，也有利于项目计划。在适当的环境中，这些工作能为改善服务带来宝贵的信息。但是，这些方法越来越多的为政府和多边机构所采用，以进行国家级人口规模估测，这个趋势令人忧虑。

绝对不能低估或忽视这些方法对性工作者安全、私密和健康的潜在威胁。全球基金和其他国际捐赠者，越来越重视制定国家战略规划和概念说明时使用这些方法，但这给性工作者的安全和福祉带来了巨大风险。

如果数据收集不是为了服务计划和提供，如果收集的保密信息得不到安全保护，那么这些方法是不道德的，也是危险的。我们的讨论仍要归结到，这些如何能有助于性工作者的权益得到保护，包括他们的免于歧视的权利、隐私权、免于任意干预权和获得可达到最高水平健康的权利。

我们的讨论仍要归结到，这些如何能有助于性工作者的权益得到保护，包括他们的免于歧视的权利、隐私权、免于任意干预权和获得可达到最高水平健康的权利。这些权利在NSWP“共识声明⁴³”都有所陈述，也与《联合国人权宣言》相呼应⁴⁴。

我们的讨论仍要归结到，这些如何能有助于性工作者的权益得到保护，包括他们的免于歧视的权利、隐私权、免于任意干预权和获得可达到最高水平健康的权利。

43 NSWP. (2013).《关于性工作，人权和法律的共识声明》，爱丁堡

44 联合国(1948).《世界人权宣言》，链接：<http://www.un.org/en/documents/udhr/>

政策简报是在文献研究和收集来自NSWP成员案例的基础上撰写的。



The Matrix, 62 Newhaven Road
Edinburgh, Scotland, UK, EH6 5QB
+44 131 553 2555
secretariat@nswp.org
www.nswp.org

NSWP是一个私营非营利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编号：SC349355

项目支持：



NSWP是“弥合鸿沟”-重点人群的健康与权利项目的参与者。我们联合了近百家地方和国际组织，以实现这个使命：实现重点人群（包括性工作者，LGBT人群和毒品使用者）艾滋病/性病预防、治疗、关怀和支持的普遍可及。

更多信息，参见：www.hivgaps.org